

Philosophy
Philosophers
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

欧阳康 ◆ 著

对话与反思

——当代英美哲学、文化 及其他

The Series of the Research to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ers

Dialogue and Reflection: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Cultures and Others

人 民 出 版 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课题成果

Philosophy
Philosop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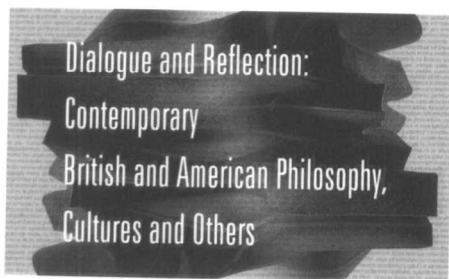
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

The Series of the Research to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ers

欧阳康 ◆ 著

对话与反思

——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士章

装帧设计:闫志杰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欧阳康著.

(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01-005002-3

I. 对… II. 欧… III. ①哲学-研究-英国-现代②哲学-研究-美国-现代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9815 号

对话与反思

DUIHUA YU FANSI

——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

欧阳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23.75

字数:311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5002-3 定价:3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

总 序

欧 阳 康*

值此《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问世之际,请允许我对该丛书的筹划过程、学术背景、相关情况和主要内容结构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一、架构世纪之交的中西学术之桥

在 20 世纪世界哲学的发展中,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英美哲学以其逻辑和语言分析见长的科学主义流派而与法德等国的人本主义流派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哲学的两大流派之一;二是随着英语成为世界的通用交往语言和学术语言,英语也成为世界哲学界的通用语言,相应地,英语世界成为世界哲学论坛的主流地带,英美尤其是美国实际上成为了世界哲学的中心。据说在美国有万余人以专业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为职业,其数量大概为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哲学家的总和;在美国出版的专业哲学杂志则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出版的专业哲学杂志的总和还要多。正如有美国学者所言,世界上几乎所有最优秀的哲学家都不得不关注自己的作品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并以能够用英语发表或再发表自己的作品作为加入世界哲坛的必要途径,许多人尤其以能够在英美、尤其是美国获得哲学教职和从

* 欧阳康,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所所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事哲学学术的专门研究作为自己的骄傲。美国的哲学“工业”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甚至有美国哲学家认为,从许多方面看,美国在世界哲学中的统领地位比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统领地位要高得多。^① 在这种意义上,学习和研究英美哲学,对于了解和学习当代世界哲学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应当说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对于英美哲学,长期以来我们由于种种思想误区而与之处于隔离和拒斥的状态,不仅对其发展状况不甚了了,还存在着很多的思想误解和学术误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员交流和学术交往剧增,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仍存在着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我们对于英美哲学的宏观了解主要是通过中国的研究者引入和介绍的,其间渗透着引介者的学术理解和加工,从总体上看属于二手资料,其间难免存在某些“学术间隔”;二是由于翻译出版的周期较长,在我们所了解到的英美哲学和英美哲学发展的最新走向之间总是存在着相当长的“时间差距”,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总是有相当的滞后性。这种情况妨碍着我国学者与英美哲学家的直接交流与对话,更难以帮助我们迅速走到国际学术的前沿。

正是有感于英美哲学在 20 世纪世界哲学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尤其是有感于我们在学习和了解英美哲学中所存在的“学术间隔”和“时间差距”,笔者利用到英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的机会,约请了当代英美哲学的一批著名哲学家,为中国读者撰写了这部全面介绍当代英美哲学的学术著作。

1995 年 9 月到 1996 年 8 月,笔者应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邀请和资助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哲学系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当时英美哲学正在积极总结和反思 20 世纪英美哲学的进展,一批重要的哲学丛书和哲学百科全书问世,令人感到非常振奋。尤其是我的合作导师洪德睿奇(Ted Honderich)所主编的《牛津哲学指南》(Ox-

① 参见欧阳康:《当代美国哲学走向——访美国哲学教授皮特·赫尔》,载《哲学动态》1998 年第 11 期。

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刚刚出版,处于热销之中,从中了解到英美哲学的最新成就,也使我对东西方之间的哲学“学术间隔”和“时间差距”有了更直接和更深刻的理解。于是萌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请英美的一流哲学家直接为中国读者写书,直接介绍当代英美哲学和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现实存在的“学术间隔”和“时间差距”。在洪德睿奇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我设计和主持了一个“向中国介绍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大型国际合作项目,邀请当时英美仍健在的一流哲学家为中国哲学界合著“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学术著作,其目的在于架起一座直接联系中国和西方哲学家的桥梁:一方面使西方学者能够关注中国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的当代发展创造更加直接的条件。该书的写作计划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当代英美哲学概述,请一些优秀的哲学家概述英美哲学的基本学术进展和各分支哲学与部门哲学,这些哲学家应当是各领域的佼佼者甚至最好是领衔者,以使该书具有宏观性和权威性;二是邀请最优秀的一批哲学家来写他们自己的学术自传,帮助他人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也有助于消除对于他们作品的不同理解以至争议。

该计划的实际运作是非常艰辛的,顶尖级的哲学家都非常繁忙,超负荷的写作任务和项目的预期完成期限使得他们中的不少人未能接受邀请,为此需要不断地调整作者。我在当时发出和接收了大量的信件。但该项目的吸引力恰恰在于中国广大读者群,为此仍然得到许多英美哲学家的积极响应,最终有 36 位哲学家接受邀请并且提供了高水平的稿件。不少英美哲学家为如此众多的著名哲学家参与此课题和专门为中国写作而感到惊叹和振奋。据英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些朋友估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如此众多如此著名的英美哲学家应中国学者之邀而专门为中国哲学界合写的第一部图书。

二、领略英美一流哲学家的大师风范

与英美一流哲学家的交往是一段令人兴奋而难忘的经历,不少 3

学术大师的风范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牛津大学教授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爵士是第一个给我回信的著名哲学家。当时他已经 87 岁,久不写作了,但为了向中国哲学界介绍英美哲学,他对着录音机开始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并形成了他最后的作品《我的学术之路》(“My Intellectual Path”)。柏林爵士也是最早向我提交个人学术自述的哲学家。他的参与对于其他哲学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遗憾的是,柏林爵士在 1997 年 11 月 5 日与世长辞。1998 年 5 月 4 日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以《最初的和最后的作品》(“The First and the Last”)为题,刊登了柏林爵士的两篇文章。一是他在 12 岁时写的第一篇英文习作:“Purpose Justifies the Ways”(《目的就是手段的理由》),一是他在 87 岁时写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我的学术之路》(“My Intellectual Path”)。在第二篇论文的前面,柏林的学术助理亨利·哈蒂(Henry Hardy)先生写了这样几段话:

“1996 年 2 月,以赛亚·柏林 87 岁,他收到中国武汉大学哲学教授欧阳康的一封信,邀请他写一篇关于自己的学术思想概要,将译成中文出版,收录该文的书旨在向中国哲学家和哲学系学生介绍他们在中国不易了解到的当代英美哲学。

1988 年柏林陈述他的学术信条的文章《追求理想》(因他对伦理学的贡献而获 Agnelli 奖后的答谢词)在《纽约书评》上刊出,以后,他没再写过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尽管他并非智慧衰竭,而且还不时写点东西。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实际上已放下了他的学术之笔。

但这个中国项目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为这个新的读者群十分重要,并感到有义务去响应。他告诉欧阳康教授他会努力去写点东西。面对一张仅仅写着纲要的白纸,他对着录音机录下了第一行文字。当他核看了经过编辑的文稿并最后插入了一些文字和作了一些调整后,他说,由于他的个性就是对重读自己的作品毫无兴致,所以 he 不想再看这沓纸了。事实上,这是他所

写的最后的文章。”^①

柏林爵士的学术自述在《纽约书评》发表后,我先后收到不少海内外朋友的来信和来电,对我的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柏林爵士的支持表示祝贺,尤其为该文是柏林教授的绝笔之作而倍感珍惜。他们还对我的这个研究项目及其进展情况表示出很大的兴趣,有的还希望进一步了解我与柏林爵士的交往情况。我想,正是柏林爵士的中国情怀,不仅使得他能够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的学术做出一个完满的总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了解他学术思想的极为权威和重要的作品,还带动了 this 国际学术交流项目的顺利开展。

牛津大学教授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爵士也是对中国哲学界情有独钟的英国学者。他多次来中国访问,与中国哲学界有很好的交往与友谊,加上当时我的好友余纪元博士正在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编辑英汉哲学大辞典^②,与他联系非常密切,从中做了一些介绍,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斯特劳森不仅很早便同意向我的研究计划提供他的学术自述,把他应印度哲学学会邀请所作的学术自述《我的哲学》(*My Philosophy*)提交给本丛书,还帮助我征得印度哲学学会对于在中国免费发表该文中文版的版权许可。他还欣然应允了我对他作学术专访的愿望。记得那是 1996 年 6 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在他家的后花园里,红花绿叶,繁花似锦,色彩缤纷。他专门准备了蛋糕、点心、清茶等。相对而坐,听他介绍他的学术历程和哲学思想,其思想之清晰和逻辑之严密,令人深感学术大师的理论魅力,而其态度之慈祥和友善,又使我每每忘记是在与世纪性的哲学大师对话,而是在和一个可亲的老人谈心。

哈佛大学蒯因教授在 20 世纪后半叶成为英美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他对本项目的关注和支持却令我感叹。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

① 参见欧阳康:《在世界与中国之间——英国著名哲学家柏林爵士的中国情怀》,收入欧阳康著:《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② 该书已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的书名由人民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

“很抱歉用了6周的时间思考后才能够回应你的邀请。在此期间我花了很多心思和努力。一开始我曾希望能够用1万字来概括我的哲学,但我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新鲜感。后来我尝试在已经写成的文章中做一个综合,但也难以做到。现在看来只有一种办法,就是采用我于1995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刺激到科学》(*From Stimulus to Science*)中的第15至99页的内容,但它有2.4万字。如果你或一个对我的思想比较熟悉的人来做一些删节,我将会非常高兴将其提交给你。我也会帮助你获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许可。一个编辑的客观性眼光应当比我去做这件事更好。”后来还是他邀请了他过去的学生、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系主任纪必信(Roger F. Gibson)教授执笔删改,然后又亲自做了审定后寄给我。1998年在波士顿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我见到蒯因教授,谈到这个项目,他还清楚记得并问起项目的进展,并欣然与作者在会场合影。

与20世纪科学哲学大师托马斯·库恩的一段通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怀念与哀思。他在收到我的邀请信后于1996年3月5日很快以电子邮件回信表示:“我意识到你希望填补的沟壑,你的计划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不幸的是,我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不允许我为你贡献了。我尚有的精力要留下来完成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所言自己的健康状况的严重性,很快给他回电子邮件,谈了他在中国的影响并继续希望他能够为本书写作。他于3月9日回邮件,“如果我的健康状况出人意料地能够改善到足够的地步,我将尝试为你送来一些材料。不过,你不应该认为我一定能够做到。”我于3月10日给他回邮件,感谢他的理解和支持。他的夫人Jehane R. Kuhn于3月28日给我寄来一封亲笔信:“我以我丈夫的名义感谢你的来信。他现在医院里,看来一定会有几个月不能工作。因此,他谢绝所有新的写作邀请和要求,不管它们多么吸引人,以便能够完成正在进行的工作。请原谅这种无奈的反馈。”6月20日,由利物浦哲学类电子邮件网转发到我电子邮件信箱里一条由《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于19日发布的消息,“托马斯·库恩逝世”,该

文由 Lawrence Van Gelder 撰稿。我这才有所领悟,马上给他家里发去电子邮件表示深深的哀悼!

泰德·洪德睿奇(Ted Honderich)教授对于本研究项目的提出、设计和实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时我在伦敦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他是我的合作导师。他不仅关心着我的学习、研究和生活,尤其是指导我不断地推进了这个项目。在我刚刚萌生做这样一个项目的念头时,他的肯定给我以信心。当时他所主编的《牛津哲学指南》(*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刚刚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对于整个哲学界的学术和人员状况也非常熟悉。他热情地帮助我做出了总体设计并指导我在众多的英美哲学家中做出可能的选择。在项目遇到困难时,他随时提供富于智慧的建议,并不断地帮助我改进研究方案。他的关心和支持,使得我能够下定决心把本项目不断推向前进。遗憾的是,出于谦虚,他坚持谢绝为本书撰写他的学术自述,这使我对他抱有更高的敬意与谢忱。

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是本丛书英文版的合作主编之一,他也对本书的形成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与斯蒂夫的相识与交往源于我们对于社会认识论的共同兴趣。自拙著《社会认识论导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后,我们便开始了围绕社会认识论的学术交往。开始是他约我为他所编辑的英文版杂志《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撰写了介绍当前中国的社会认识论研究进展和我的社会认识论研究成果的英文学术论文,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有关社会认识论的长篇对话,刊发在《哲学动态》1994年第4、5期。在我访问英国的后期,为了使该书的英文稿件能够更好地得到编辑处理和学术把关,我请斯蒂夫教授加盟该项目,作为英文版的第二主编,得到了他的赞同和大力支持。他在与英美学者的进一步联系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也是本丛书的作者,撰写了《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中的“哲学在20世纪英语世界的命运”一章,以他的独特视角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英美哲学。本书记载了我与他多年的学术友情!

三、透析当代英美哲学的多元视角

在向英美学者征稿的同时,笔者提出了一个希望,即请他们谈谈对于 20 世纪哲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一些学者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现将他们的部分意见分类做些介绍,从中不难看出他们透析当代英美哲学的多元视角。

1. 关于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总体格局问题

20 世纪世界哲学的重大特征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流派的分野。对此许多英美哲学家持有非常强烈的批评态度。但他们各自的批评角度却有所不同。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教授为本丛书提供了学术自述。他对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总结是从批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角度展开的。他说:“20 世纪里的哲学家大体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主张哲学应当更接近科学,另一类主张哲学应当更接近文学。我是属于后者。我一直对 20 世纪哲学中的分析传统抱有疑虑,他们倾向于科学研究。那些主张使哲学更接近于文学的哲学家与黑格尔相似,他们被历史之诗所吸引。历史之诗,指那些在西方社会与文化中戏剧般地发生着变化并构筑了现实的东西。那些主张哲学研究应当更加接近于科学的人则信奉罗素所言,‘逻辑是哲学的基核’。我认为,分析哲学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是在爬山——创造了一种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为中心的哲学,但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是在回归。蒯因、库恩、后期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都在致力于说明,那种认为语言有一种可以用逻辑方式来加以揭示的结构是错误的。所以我不知道,除了使哲学回到在詹姆士和尼采时代便有的辩证立场外,分析哲学在 20 世纪里还有什么价值。在我看来,20 世纪西方哲学中不属于分析哲学传统的优秀哲学家,德里达、杜威、伽达默尔、福柯、哈贝马斯,比分析哲学家的功劳要大。

因为他们揭示了迄今为止仍在进行的西方文化史向我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他们之间的差异和论争戏剧般地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使我们知道如何在 21 世纪比 20 世纪更好地工作。”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哲学家达米特(Michael Dummett)教授也提供了他的学术自传。他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问题,认为当前的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是存在着分析哲学传统和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巨大鸿沟。这对健康的主体来说无疑是个明显的伤害,因为不同的主体要分属于不同的而且彼此之间很难交往的传统。这样的鸿沟在 20 世纪初还没有,是在 20 世纪里创造出来的。所幸的是,这种鸿沟在近几十年来比它的过去有所缩小:欧洲国家的一些年轻的哲学家熟悉两种传统并试图把它们内在地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调和仍然是很不完善的。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在 20 世纪初期这种鸿沟是如何形成的,这种调和就不可能令人满意。英美的绝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道大陆哲学家在干什么,绝大多数大陆哲学家也对分析哲学知之甚少。但是绝大多数英美哲学家也忽略了其他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就好像他们也被其他哲学与文化传统所忽略一样。

2. 关于英国哲学和美国哲学的关系问题

通常认为英国哲学和美国哲学是一体的。但也有哲学家指出了英国哲学和美国哲学之间关系的细微变化。过去是英国哲学居于主要的地位,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哲学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于是英国哲学家和美国哲学家之间在感觉上也发生了变化。就像过去英美哲学家忽视其他哲学传统一样,现在英国哲学家也受到了美国哲学家的忽视。达米特认为:“欧洲的哲学家现在开始有了相似的经验,他们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即受到美国哲学家的傲慢的忽视,他们把自己划出了欧洲哲学的传统。直到 60 年代末,美国的大多数哲学家还有把自己看做英国的一个省的感觉。现在他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们相信除了美国以外,不可能生产出好的作品,因此他们除了关注美国本土的作品以外,不必关注美国以外的进展。在这种意义上,美国人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并不歧视其他的民

族,但他们毫不动摇地相信,除了在美国,其他地方不可能生产更好的东西。只有当外国人以完全美国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的研究,以美国的认知方式来写作,当然还要写成英文,美国人才会注意它们。对于早先曾经对其他地区的哲学与文化有过这种优越感的欧洲的思想家来说,能够体谅一下美国人对他们的类似态度,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事。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你想参与当下的分析哲学家之间的争论,你使用你自己的语言来写作,那是毫无用处的,相当比例的职业的哲学家决不会读你的文章。这种情况在科学里也许是可以容忍的,但在哲学里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像自然科学要以普及的形式得到保存。”

3. 关于当代英美哲学的主要贡献

英国杜姆大学哲学系著名逻辑学家洛厄(Jonathan Lowe)教授为《当代英美哲学地图》撰写了“逻辑哲学”一章。他指出:“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对于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那些长期留下的哲学问题进行证明,有时还提供结论。这些方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像弗雷格、罗素等这样的哲学家在20世纪初由逻辑学中发展出来的。在20世纪的20年代,一种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对分析哲学以很大影响,分析哲学家通过语言哲学来探索哲学问题,成为一种潮流。在50—60年代期间是所谓的‘日常语言哲学’占据统治地位,尽管没有多大的效果(不过在英国哲学中的影响比美国哲学中的影响要大一些)。后来,分析传统由于集中于其他哲学问题而有所复兴:先是心灵哲学,后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问题在30和40年代时遭到逻辑实证主义的拒斥,现在得以走出阴影。以上领域在我看来至今仍然是最有成效的研究领域。”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著名教育哲学家怀特(John White)教授是《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中“教育哲学”一章的作者,他谈到了教育哲学在20世纪哲学发展中的地位。他认为,教育哲学仅仅是在20世纪里才作为一个哲学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只有个别人,如

Herbar,偶然地探讨教育哲学问题。杜威使教育哲学得以确立,并厘清了教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后,教育哲学在美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分支哲学,随后在英国和世界的其他国家也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伦理学由元伦理学研究向规范伦理学甚至是应用伦理学方向迅速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趋势给教育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一方面是提供了更多的得到提升而又能应用于教育哲学的新的哲学材料,另一方面是使教育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更加密切。自从杜威以来,20世纪的教育哲学史是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框架下进行的。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这种社会制度,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成果对于许多国家的思想家和政策的制定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南非、东欧国家、韩国和日本等。

4. 关于中西哲学的异同问题

罗蒂教授指出,我认为中国的思想家应当思考 Fritz Stahl, Ninan Smart 等人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的文化史与西方的文化史是否不应当有如此大的不同,并将那些叫做哲学的东西也彼此隔离起来了。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学分析的迷宫中发展起来的,在17世纪以后则出自数学物理学。其中很大的部分还是来自把原初的科学(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科学)和某些宗教(基督教)的传播结合起来的努力。这里的部分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和一神论及僧侣宗教之间的斗争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很少,因此由西方人提出的许多“哲学问题”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说并不是问题。相反亦然,许多对于中国思想家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也难以引起西方哲学家的兴趣。在我看来,如果认为存在着对所有文化和所有哲学家都感兴趣的“哲学问题”,这是不对的。与其问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不如问中国和西方思想家们在历史进程中所关注的、解决了的、没有解决的和正在面对的问题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怀特教授在谈到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时说,我相信我们的学科将会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中获益,因为中国有着重视社会教养的悠

久传统。社区主义的观念最近进入了西方教育哲学并成为了前沿问题,以便调适长期以来的个人主义传统,它也将成为联系两类学术群体的纽带。与此同时,相反地,教育界重视个人的自我决定作用的努力也会对中国教育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的教育哲学专家之间已经建立了很多稳固的联系,最近英国的教育哲学家的许多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为中文并在中国北京的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期待着这种联系在新世纪能够得到加强。

5. 关于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

洛厄教授提出,哲学对于问题的关注由于哲学家们不断地加强了与其他学科的实际工作者,如心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结合而得到增强。这部分地也是由于所谓的“自然化的认识论”(naturalized epistemology)变得流行的结果,这种认识论把哲学定位于与自然科学联盟,蒯因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些更加深入的哲学问题产生于形而上学和经验科学之间。在我的心目中,尤其是意识问题(consciousness)和量子理论问题(quantum theory),后者也许是目前最成功的物理学理论。有些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这两个领域实际上是内在相关的。在分析哲学家和西方科学家中对于意识本质重新燃起的兴趣,也许表明了世界各地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之间日益广泛的合作,特别是在亚洲,有关注心灵问题的悠久传统。西方思想家对于能否用他们的传统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再那么自信,于是必然导向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更加深入的相互理解和更加广泛的合作。

达米特教授认为,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真理和意义的问题。尽管人们对它们非常重视,但在解决它们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却非常缓慢,这里的特殊原因是由于强有力的偏见青睐现实主义的形而上学。被这种偏见所统治的人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说明现实主义是真的,其实他们的任务应当是说明现实主义怎样才能是真的。无论如何,进步还是有的,我们也可以期盼在未来的20到30年里取得更

大的进步。最近在分析传统中有一个更大的进步,那就是发展出一种与语言相独立的思想的哲学:我们对于思想的把握是自动地呈现的,而不是从对表达它们的工具的掌握中得出的。这样,正如我相信的,在它的内部尽管会有错误,也不会影响到真的问题和思想的内容,这实际上是对于智力行动的社会特点的批判。我们不会生活在别人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即人类世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能够彼此相互作用,也都能思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考能力与我们对于语言的应用一样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一种与语言相独立的思想的哲学必然导向一种唯我论。这种唯我论将去除我们对于环绕着我们和造就了我们的人类社会的依赖。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宗教学教授斯温伯恩(R. G. Swinburne)为《当代英美哲学地图》撰写了“宗教哲学”一章。在谈到英美哲学的历史和未来时他指出,我认为英美哲学传统在近三十年来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英美哲学家们正在呼唤并从现代科学发现中探寻一种严格的和普遍的形而上学以便提供一种普遍的世界观。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英美哲学家用了许多的技术手段来分析语言的结构和句子的意义。现在他们在探索和分析那些构成有效证实理论的东西,并运用它们来比较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我完全赞同这样的发展方向。不过我也认为,尽管不是全部,但大多数的哲学同仁所探讨的形而上学还是建构在过于狭窄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过多地为物理学的发现所吸引而希望建构一种物理学主义的形而上学。但是如果他们也严肃认真地关注精神世界(如情感、思想等)和我们这个世界的某些非常广泛的特征,那些到处都存在,并经常与科学规律相违背的现象,他们就可能会更多地去探索和建构一种非物理学主义的形而上学,甚至特别是一种宗教形而上学。但是在方法方面我是一个完全的英美哲学传统的主张者,重结论,而少有一致。但是不同哲学分支和不同哲学观点的交流和互动是绝对必要的和有益的。我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富于说服力和更坚实的可能性充满信心。但是与物理学或数学等相比,哲学是一种非常不同的

事业,它也许要几千年才能达到。我还认为,大陆哲学传统,近二百多年来流行于欧洲大陆的哲学,在不那么严格的同时,对现代科学也没有那么敏感,但与英美哲学传统相比已经表现出对于广义的文化和艺术的更多兴趣。但是我感到它们已经偏离了主流,哲学的未来将属于英美传统。

怀特教授谈到了教育哲学中的新趋势。近十年来,国际化的学者感到了跨地域性的学术合作的迅速增加。例如,在1986年前,英国和美国学者之间的交往都很少,现在这种交往已经非常频繁了。各地的学者都频繁地参加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会,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或出版国际性的学术论文集。这种趋势随着电子邮件的使用变得更加明显,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快。我想,这也意味着英语将在我们的领域中占据统治的地位。一个与上述相关的趋势将发生在学术研究的内容方面。在许多国家,人们共同注意着这种转换,文明教育和鼓励个人独立思考将取代机械地学习和在共同价值与特殊价值之间的被动选择。电子邮件的使用会帮助全球各地的各方面哲学专家之间的跨地域合作。我希望这种专业化能与教育的宏观目的相协调。怀特教授还认为,在当前人们面临的多种问题中,有一个问题一定会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就是工作的前景和它在人类实践中的地位问题。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西方世界正在面临着一种文化转变,与三百多年来的文化传统不同,我们正在使工作不再是人类存在和活动的中心,这就极大地冲击着我们的教育观念:我们为什么和应当怎样接受教育?也许我们现在应当帮助人们为一种自我决定的生活(*self-determined life*)而做好准备,在这种生活中,工作(如过去的雇佣劳动)的地位比过去大大削弱,人们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其他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教育的目的和它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里,学校的位置何在?它们应当怎样来组织?我在《教育和工作的目标——一种关于工作和学习的新哲学》(*Education and the End of Work: A New Philosophy of Work and Learning*, Cassells, 1997)一书中探讨了工作的哲学和它在教育中的应用。